

我的世界语人生

刘 铃



我出生于 1927 年,是地道的北京人。世界语名 Sesdek,曾用名刘兆荃(用于旧中国)。1939 年在成都华西大学附属高中吴先忧校长开办的星期日世界语班开始学习世界语,虽然因故未能坚持到底,但对世界语的感情已经生了根。1946 年我毕业于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为了正音曾去函社见了冯文洛老师一次,看到他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干世界语的,印象深刻,很受教育。抗战胜利后,1947 年我回到北京,就积极寻找当地的世界语者,在重庆和天津世界语者的帮助下找到了汇川和赵炳南(都是报社记者),因人数太少无法成立组织,也无法庆祝世界语诞生六十周年,我就作为北京世界语者的代表参加了天津世界语者的庆祝会。天津的会在周原阜家举行,当晚我就住在周家,经过长谈我得知周收到许多各国世界语者的来信,但来不及处理,周约我来帮忙。不久,我学了英文打字,再次赴津开始用世界语进行国际通信。1946 年年底,在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引起全国民众的游行抗议,我就在复信中揭露美军的暴行,这是我用世界语进行对外宣传的开始。后来,周为我解决失业问题,介绍我到华隆总行当练习生,后升办事员。这是一个不到十人的小贸易行,周是股

东之一，做倒卖粮食和进出口生意，我负责向客户收款和跑银行，平时在家摘录报纸上的重要行情，我主动买了坐标纸，画了统计图，供领导参阅。半年后，华隆总行宣布因亏损歇业，我又失业了。副经理突然问我愿不愿去解放区，如愿意可找周谈。我在重庆北碚国立重庆师范上学时，课余学习世界语，班上有个三青团员看见我的世界语书上有绿星就问我，为什么用五角星，是不是和共产党有甚么关系，我回答说五角星并非共产党专用，世界各国都用五角星，但颜色不同意思也不同，美军的汽车上都有个白色五角星，不会和共产党有关系。有这样一个三青团员盯上了我，我不敢在教室里公开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好在学校没有围墙可以随便上街，又很近，我就每天饭后去街上的新华日报发行站看报，加上受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和附近江苏医学院的进步学生的影响，我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毕业后在北碚山区小学教书时，校长比较开明，我就自己订阅新华日报，组织同事演出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并亲自主演，还到天府煤矿为工人演出陕北秧歌剧《一朵红花》。由于早就心向共产党，听到能去解放区感到喜出望外，欣然同意。这次见周，才知道周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就是这样通过世界语的关系找到地下党，参加了革命。周向我传达了党的决定（送我去解放区）和要求（去解放区要改名字）。1948年初，我背着父母离家出走，根据党指定的路线和接头的方法，化装成去济南的商人，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特并不严格的盘查，进入了解放区，改名刘铃（用于解放区及新中国），正式参加了革命。令我惊讶的是，接头语竟是“天津李振中介绍来的”，这个李振中就是我在华隆的同事。后来才知道，华隆总行就是天津地下党设立的一个机构，在我走后华隆又继续开业，又招收了一名知识青年，最后也参加了革

送到河北正定，北联大政治班学晋冀鲁豫边区合联大也和晋冀鲁北大学，校长是定。没有校舍和



命。到解放区后，我被进入晋察冀边区办的华习。后来晋察冀边区和并成华北解放区，华北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成华吴玉章，校址还在正食堂，生活条件非常艰很快。当时傅作义还是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统帅，曾经派骑兵偷袭冀中解放区，我们这些学生就打起背

包, 连夜急行军转移到邢台, 敌军撤走后又回到正定。为防国民党空袭, 分散住在郊区农民家, 也学会了像八路军一样为农民服务。1948 年底,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 我们这批政治班的学生都提前毕业, 到平山接受党中央的集训, 和各地抽调来的老干部一起学习城市政策, 然后兵分两路, 行军到平津外围待命, 我被派往天津。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时, 我随军入城, 作为军管会的干部参加了接管工作。我被派往第九区, 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接管全区的小学校。我工作很积极, 不久参加了共青团。

1949 年夏, 天津一位老世界语者李劳荣告诉我, 北京将要成立一个用世界语的单位。我很想干世界语工作, 就打了个报告, 各级领导都很支持,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这个用世界语的单位还没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不同意我留在北京等待, 责令我回天津原单位。我听说冯文洛老师已经调来北京师大附中, 就去看望他一次。正赶上开国大典, 我就在路边看了游行队伍后回了天津。回到天津后我被派到九区第三小学任政治教员, 后来区里成立领导各小学的文教委员会, 我又被抽调出来。后来九区改成八区, 我历任八区人民政府文教科科员、统计股股长、并当选团支部书记。1950 年我就申请入党, 支部大会已经通过, 但区委没有批, 因为我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 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 外调比较困难, 只好先挂起来。



1952 年, 冯文洛同志已经是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的负责人, 通过人事部门商调, 把我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工作, 我从此开始从事世界语专业工作。我担任助理编辑, 从打字、校对开始, 参加了世界语实际工作。1953 年,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搬来与《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合署办公, 一个班子, 两块牌子, 兼做两家的的工作。我和协会来的陈世德、杨永森在新成立的通联组搞通联工作。1954 年, 受兄弟国家的干扰, 《人民中国报道》被迫停刊, 全国世协也停止工作。工作人员部分调离, 有的去了东北, 有的去了青海。我被留在外文出版社当了工会脱产副主席, 不久当选团支部书记。后来外文出版社搬离在国会街的新华社大院, 进了在城郊百万庄新建的外文大楼。我当过计划统计科科员, 后来调图书编译部当业务秘书。后来平行的各部都独立成社, 图书编译部改名外

文图书出版社，对外出书就叫外文出版社。1957年，胡愈之同志去苏联和东欧考察归来，向中央报告世界语仍然可用。于是《人民中国报道》在对外文委领导下复刊，协会也恢复工作。1963年在外文大楼成立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一领导对外出版发行工作。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和全国世协也搬到外文大楼，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和外文图书出版社是同属外文局领导的平行单位。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也出部分图书，主要是毛主席著作，他们负责翻译，然后发稿给我，由我负责列入图书社的计划，用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是我负责出版世界语图书的开始。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的负责人李柰西同志向外文局罗俊局长要求把我调回中国报道社归队做世界语工作，但我在图书社做计划统计工作有所创新，干得不错，正副局长和图书社的领导都比较满意，不愿意放我走，经过李柰西同志多次交涉，局长才答应等调来适当人选时放我归队。1965年，图书社调来一位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接替我的工作，我才被借调到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我到报道社后，李柰西同志给我的任务，一是去广播学院世界语班当辅导老师，协助冯文洛、陈世德老师批改作业；再就是在报道社开个班，教一批复员军人学世界语。这两个班毕业后，学员分配到国际电台、国际书店、报道社和图书社。后来我又回到图书社，带领分来的八位广播学院毕业的世界语学生和报道社开办的世界语学员以及我从报道社要来负责改定稿的冯文洛同志，在图书社翻译部成立了世界语翻译组，我被任命为组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出版世界语图书的国家机构，也是我正式负责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外文局造反派掌了权，武斗的气氛很浓，图书社一些主要出版毛主席著作的语文组想搬出外文大楼，在友谊宾馆成立毛选翻译室，由于是出版毛主席著作，谁也不好反对。世界语组除一人愿意留下跟着造反派闹革命以外，大家都愿意搬出去避免武斗，于是我们也参加了友谊宾馆的毛选翻译室。武斗是避免了，但清理阶级队伍毛选翻译室也不能例外。世界语组大部分是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青年学生，只有我和冯文洛是旧社会来的，自然只有我们是审查对象。我的组长当然只能“靠边站”，由年轻同志取代。每天有人监督我们在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有时开批斗会，年轻同志革命热情高，批斗时不惜上纲上线，火力很猛。有一次批斗会上我突然晕倒了，好在友谊宾馆的医务室就在楼下，找来大夫打了强心针救过来了，后来的批斗会就缓和多了。在被

审查期间，我把毛主席著作中各种词语的世界语译法收集起来，制成卡片，然后找一位学生帮忙油印，装订成一大厚本词典，供同志们参考。最后清队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找到证明人，得到了澄清，因此宣布我被“解放”了。毛选翻译室结束，我们回到外文局，掌权的造反派坚持把我下放到河南干校去改造。干校的班排长都是造反派，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过的是劳动改造的生活。后来运动出现了反复，造反派的班排长全被撤换了，军代表任命我为他们连的一排排长兼二班班长。当时大家劳动积极性不高，三夏大忙时我只好拼着老命自己带头干，带动大家下地去干活。后来干校实行轮换，北京来了一批，我也第一批回了北京。



回京后，一些领导干部恢复了职务，我也恢复了组长的职务。我决心好好干一番，我认为，根据国外世界语者的情况，不可能要求人家只读毛主席著作，天天背语录，除继续出好主席著作外，必须扩大选题范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已经出了塑料封面本，从第二卷起改出精装本。此外增加了《鲁迅小说选》和《中国文学作品选》等文学作品，特别要增加介绍中国基本知识的选题，还要出儿童画册。这些都逐步做到了。组内有的年轻同志为清队批斗的事向我道歉，我毫不介意，认为大家都是响应号召闹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清队帮我解决了挂了几十年的历史问题，我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能考虑谁批斗了我。

1979年，为了便于集中使用世界语力量，外文局决定图书社世界语翻译组并入中国报道杂志社(1973年后《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的中文名称更名为《中国报道》，外文名称不变)，我被任命为图书部主任，继续负责世界语图书的出版工作。1981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我在出版社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从创办到初具规模，我一直是实际工作者，主持着出版社的工作，后来经社领导同意我用“业务负责人”的名义对外联系工作。为国内世界语者出版工具书和学习用书也是出版社的任务之一，我推出了拳头产品《世界语汉语词典》和《汉语世界语词典》，后者是我主编的，但受文革的习惯影响书上没有署名。我用编译合一的方法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改革，为了帮助国外读者理解中国的事物，直接用世界语对许多书加了注解，还为《骆驼祥子》加了一幅老北京的地图。选题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文学作品一向是世界语读者喜欢的选题，我们出版了三

大本精装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还有矛盾的《子夜》、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老舍的《骆驼祥子》等文学名著。我一直把介绍中国基本知识作为出版社对外宣传的重要任务，我认为出版社从长远考虑，应该出书系列化，我推出了《中华五千年》等中国基本知识丛书和《阿凡提的故事》等民间故事小丛书，此外还出了不少连环画和儿童画册。通过来华访问和书信往来，我和日本著名世界语作家宫本正男成了好朋友，我们合编了《绿川英子文集》。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者，抗日战争时期来华，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她曾在武汉用日语进行反战广播，日本军国主义者骂她是“娇声卖国奴”，周恩来同志当面表扬了她，后来她因病死在东北，葬在佳木斯。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把《绿川英子文集》作为中日合编的重点书出版。宫本先生提供了许多绿川的珍贵照片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在 6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我认识了德国哲学家 Bruno Vogelmann，后来他来华访问过，几十年间和我书信不断，这是我联系最多、最久的国际友人。Vogelmann 向我推荐了欧洲出版的《九种语文国际贸易辞典》，建议我加上中文和日文出版亚洲版。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中文和日文的翻译都由我亲自向国内外约稿。中文的翻译由周力同志帮忙找内行人担任，周力就是当年引导我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周原阜，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周力，调到北京外贸学院当了外语系主任，仍然热心世界语工作的他担任了全国世协机关刊《世界》杂志的编委，为世界语出版社从日文翻译了《世界语前置词略解》。《十一种语文国际贸易词典》出版后，世界语出版社的出书品种更丰富了。世界语出版社出的书越来越多，没有自己的翻译力量是不行的。图书社世界语翻译组合并到报道社的时候，除了我继续负责图书出版工作以外，其余大部分同志都合并到期刊翻译组了，现在又分出一部分成立了以谭秀珠同志为首的图书翻译组，世界语出版社终于有了自己的翻译组，队伍更加壮大了。1987 年，应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邀请，我作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代表，和国际书店世界语科的孙晓燕同志一起访问了南斯拉夫，参加了萨格勒布的国际书市。书市上只有书没有刊，我只能用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名义参加。书市举办了旅游图书报告会，我发言介绍了中国出版旅游图书的情况。国际文化服务社在书市上设了一个世界语图书的摊位，这是实地考察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世界语图书的反映的好机会，我亲眼看到，中国的世界语图书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卖得很快，我们不得不把原来带来准备送人的书都拿出来卖了，

可见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世界语图书还是很欢迎的。我对萨格勒布的访问引起当地很大关注，政府官员接见，电台采访并当天广播，报纸也及时报道并刊登了我的照片。这反映了国外对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重视。全世界出世界语图书的国家出版社只有两家，中国和越南，在印装质量和品种的多样化上越南都不如中国，所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是实力最强，最有能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在扩大对外宣传效果上世界语有着独特的作用。国际文化服务社是民办的世界语组织，没有能力请我们住宾馆，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我们吃住都在世界语者家里，都是私人接待，说的全是世界语，实践证明，世界语确实是进行国际民间交往很好的工具，它有利于拉近民心，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这次出访很成功，扩大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在国际上的影响。1989年，因为年龄关系我必须退出领导岗位，我负责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至少有二十多年，如果算上1957年恢复世界语工作后我在图书社协助安排世界语书籍的出版，就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出版的世界语图书有三百多种。

1984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由于文革清队期间我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解决了影响我入党的唯一难题，这次在报道社入党，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当时的外文局局长范敬宜同志把我作为知识分子长期要求入党的典型，不仅让我在全局党员大会上发言，还让我入党的消息上了《光明日报》。

1989年，全国世协新当选的秘书长蒋鸿章同志刚调回苏州老家，短期内很难再调回来上任，陈原会长希望我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于是我担任了全国世协的代秘书长。我上任后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上级停拨经费以后，会刊《世界》杂志很难继续办下去。我主要抓了几件事：第一、我认为全国世协和地方世协以及全国的世界语者应当互相支持加强联系，除了发展地方世协成为全国世协的团体会员以外，我认为应该“走出去”，于是我去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协的成立大会；去苏州参加了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去常熟看望了张麟瑞同志，他一人独自刻印出版了为世运服务的中文小报《绿萤 Verda Lampiro》，他的刻印技术很高，报道及时，很有特色，小报深受广大世界语者欢迎；去南京访问了江苏省世协负责人之一，《世界语邮票目录》（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宋绳坦同志；去镇江拜访了著名的世界语者王崇芳同志，世界语出版社的《骆驼祥子》《周恩来传略》等书都是他翻译的；去天

津，支持天津世协召开的面向全国的城市友好城市工作座谈会，会开得很好，交流了经验，达到了目的；去泰安，和副会长谭秀珠同志一起参加了山东省世协的年会。第二、我倡议召开全国各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世协秘书长会议。青岛市委副书记刘镇同志是了解、支持世界语的，在他影响下青岛市委宣传部也大力支持世界语工作。他们也支持召开秘书长会议的倡议，答应在青岛召开并由他们承担会务。我在开幕式的发言中诉苦较多，可能有些消极影响，听到批评意见后，我立即改正，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我就努力给大家鼓劲。会后我和青岛市委宣传部及青岛世协商谈《世界》杂志问题，决定《世界》杂志仍由全国世协负责在北京编辑，青岛方面负责出版、发行和筹措经费。我回京后把《世界》杂志的刊号转移到青岛，办完相关手续后就可以在青岛继续出版，总算为全协解决了一大难题。第三、第一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昆明召开后已经六年，应该召开第二届了，我和负责国内工作的张海平同志曾经去过武汉找湖北省世协，想争取湖北省委的支持，但没有成功。后来唐山世协积极沟通，得到唐山市委的大力支持，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就在唐山召开。全国世协也借此机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第四、1992年在青岛召开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是全国世协的重点工作，我和戴颂恩同志负责。青岛方面，刘镇同志和负责承办太平洋大会的市委宣传部也非常重视，在双方亲密合作下，几年内办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拍摄《希望》世界语教学片，并用它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世界语讲座；青岛参加太平洋大会筹办工作的有



1990年UK与克罗地亚作家 Spomenka 合影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全国世协组织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起参加了75届和7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考察了国际世界语会议的开法，同时也宣传了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并发出了邀请；我们还在青岛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由少数几个国家的代表和国际世协的代表参加，为太平洋大会作准备。唐山大会以后全国

世协已经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我已经不是代秘书长了，但太平洋大会的前期筹备工作一直是我和戴颂恩同志负责的，新秘书长就派他们二人在大会开幕前提前半个月去青岛坐镇，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如期召开，有八百多位各国世界语者参加，大会开得很成功，有中国特色，各方面都比较满意。1993年初，我结束了全国世协的工作，正式开始离休。

离休以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我想，是不是还要为世界语干点什么，我负责出版世界语图书多年，但大多出的是别人的书，是不是也该出两本自己的书，给后人留个纪念。于是我写了一本《世界语语法纲要》，正好全国世协要办教学，需要语法书，北京世协也愿意赞助，另外我还翻译了老舍的名著《茶馆》，想出一本世界语版，这两本书都由报道社用外文出版社的书号出版了。叶籁士同志去世以前，把他收藏的世界语图书都捐给了全国世协，并且表示希望成立个中国世界语图书馆加以利用。陈原同志也向全国世协和报道社表示希望成立中国世界语图书馆。我自告奋勇愿意筹办这个图书馆，于是我被任命为中国世界语图书馆馆长，和陈原同志一起为图书馆揭幕。不过我这个馆长是光杆司令，连一个助手都没有。我主张图书馆要面向全国，为广大世界语者服务。仓库里有世界语图书四千多种，还有一些建国前的旧期刊，都由我一个人从除尘开始，登记、编号、编目、办证、收费、记帐、直到去邮局寄书。后来领导为照顾我的身体，同意我上半天班。我坚持干了八年，直到2004年外文大楼要重新装修，才不得不闭馆装箱。后来图书馆的房间改成了厕所，中国世界语图书馆也就不存在了。对于我在中国世界语图书馆的工作，全国世协前任秘书长、报道社前任第一把手张企程同志给过四个字的评价：“无私奉献”。

全国世协和北京世协组织的业余活动，我基本上是每次必到，是铁杆积极分子，直到八十岁以后，才因年龄和健康关系停止参加，但还在互联网上和北京世协保持着联系。北京世协在曾禾尧同志负责的时候，开办过读书班等各种世界语学习班，我多次担任过教员，并且和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在我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生日的时候，都有一些学生参加为我庆寿的活动。我还是北京世协戏剧小组的组长兼导演，每双周的星期日活动一次，我们坚持了两年多，排练了两个世界语独幕剧《文盲》《绿色法庭》，在北京没有找到演出的机会，最后我带领全组的同志去了天津，和天津的世界语者联欢，并用世界语演出了这两个独幕剧，圆满结束了戏剧小组的工作。中国科学院科

技世界语协会也曾办过各种世界语学习班，多次请我去担任教员。

我参加过五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第一次是 1979 年在瑞士举行的第 64 届，在团长张企程和顾问叶君健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大会议题讨论并发表了题为《难以容忍的语言歧视》的演说，后来全文发表在《中国报道》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大会议题讨论并发表演说，我当场受到外国世界语者握手祝贺。第二次是 1986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这次我是大会工作人员，我和谭秀珠同志负责出版大会快报。白天谭负责出去采访和约稿，我负责在办公室守摊和编排设计，夜晚我和谭要去印厂督促工人拼版并签字付印，第二天一早有人会把印好的快报送到会场。我还负责一个太极拳班，不管夜晚回家多晚，第二天一早我要赶到友谊宾馆去教外国人学太极拳。第三次是 1990 年在古巴举行的第 75 届，这次我是中国世界语代表团的团长和国际世协执行委员，除了参加国际世协执委会的讨论以外，还出席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各国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亲自听到了卡斯特罗支持世界语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后我在《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哈瓦那归来》的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卡斯特的



1990 年参加 75 届 UK 开幕式

讲话。第四次是 1991 年在挪威举行的第 76 届，这次我是陪刘镇同志去考察国际世界语大会，但为了上主席台用世界语讲话以及和国际世协联系的方便，有关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团长，刘镇同志任副团长。听说这次台湾有人参加，为防止台湾要求参加国际世协，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我和刘镇同志一同去大使馆找大使商量并请示了外交部，出国前我已经请示了外交部，答复是一样的。后来发现台湾只去了个别世界语者，没有组织，没有发生两个中国的问题。除了参加国际世协执委会的讨论以外，我和刘镇同志一起召开了座谈会，介绍了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的筹备情况并发出了邀请。第五次是 2004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89 届，国际世协选中了我在大会大学作的题为《奇妙的汉字》的学术报

告, 报告全文刊登在国际世协出版的专辑上。大会期间我一直住在自己家里, 由于健康原因较少参加其他活动。



与全国世协、中国报道的同事们合影

世界语是一种民间语言, 世界各国的世界语组织, 除了国际世协总部和其他几个国际组织以外, 大多是各地群众自愿成立的地方组织。在中国, 也是地方世协民间味儿比较浓, 大家都是对世界语有好感才自愿加入的, 没有任何压力或顾虑, 世界语者喜欢地方世协也是很自然的。我就对北京世协很信赖, 2017 年, 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九十高龄, 剩余时间不多了, 就把自己收藏的世界语书刊全部赠送给北京世协, 觉得比自己死后家人当废品处理更有价值。



与庆祝 90 大寿的京津世界语者合影



与参加庆祝 90 大寿的国际电台世界语者合影

北京世协对我这样的老同志也格外敬重，2007 年为我举办了庆寿宴，2017 年又为我举行了隆重的庆寿集会，那天北京下了一天不小的雨，许多人冒雨来参加，有老也有少，还有两位天津的同志坐高铁快车来参加，当晚还要赶回去，我对所有参加的人感激不尽。全国世协的刊物《全国世协通讯》也用封面和两页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活动。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北京世协把各地世协发来的贺信和一些世界语者的祝词印成为我庆寿的专辑，把那天集会的集体照放大后配上镜框，由北京世协的几位领导，不远数十里郑重其事地送到我家，令我受到意外的感动，这也可以算是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世界语者的一生做了一个美好的总结。

